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王维江  
李鹭哲  
黄田  
编

王先谦  
叶德辉  
卷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王维江

李登

黄田编

藏

叶王

德先

辉谦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王先谦 叶德辉卷/王维江, 李骞哲, 黄田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0-20640-0

I. ①中… II. ①王… ②李… ③黄…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王先谦 (1842~1917)-思想评论③叶德辉 (1864~1927)-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5926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王先谦 叶德辉卷

王维江 李骞哲 黄田 编

Wang Xianqian Ye Dehui Juan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40.7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51 000

定 价 97.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 1840 年到 1949 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 导 言

在改良和革命成为时髦思潮和洪流的时代，王先谦、叶德辉成为反面角色；在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他们因站在改良和革命的对立面而反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时至今日，改良和革命不再时髦，那么，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王先谦和叶德辉，我们自身的认识视角和评判标准是否需要检讨呢？

### 一、王先谦事略

晚清的湖南人，说名儒必提及“二王”（王先谦和王闿运），说劣绅必不忘“二麻”（王先谦和叶德辉都是麻脸）。无论怎么说，王先谦都榜上有名。

他生于《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祖籍江南上元（今南京市），一个桐城派古文家辈出的地方。先祖明代封官岳州府时迁居长沙。后家道衰落，其父王锡光只能课徒自给，并对三岁发蒙的王先谦以“扶世翼教”相期。父卒，十九岁的王先谦“糊口无资”，曾三次佐幕于军营，直到1865年中进士。而后二十余年官运亨通，1885年补国子监祭酒，后放江苏学政。其间屡有建言，既想保和局，又不愿辱国体，流露出徘徊于洋务和保守间的两难心境。忽而以劾李连英获直声，又迅速以生病为借口辞官。在长沙筑居葵园，著述自娱，并主讲于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

王先谦崇拜曾国藩，他承袭了曾国藩合汉、宋的学术主张，因而他的大量著作具有既重义理又不轻视考据的特色，《续古文辞类纂》、《东华续录》、《皇清经解续编》、《荀子集解》、《合校水经注》及《汉书补

注》都是这类名作。晚年他刻印了《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和《五洲地理图志略》，又赢得了通儒的声誉。

王先谦在做京官的得意岁月里，妻妾所生两男六女皆殇。或许是自怜影只，或许是伤于世变，隐居的王先谦纵情于声色，友人王闿运说他家“门多杂宾”，“人以为侈”。1904年，友人费某三饮于王宅，六十二岁的王先谦身边始终有“雏伶侑酒”，费某将王比为李渔和袁枚，王颇不快。所谓“惟把书度日”的真相被人窥破了。

1898年前后，王先谦认定梁启超等“志在谋逆”，率门生苏舆、叶德辉、宾凤阳等呈递《湘绅公呈》，要求禁遏维新言论，以端学术。1906年，门生梁鼎芬奏请擢用乃师，王以“名心素淡”辞。次年，王因头眩而跌跤，宣布闭户谢客，但仍身膺湖南学务公所议长职，以致颇想取而代之的王闿运背地里讥责其“贪居议长”。1908年，王被礼部聘为礼学馆顾问，被朝廷赏以内阁学士衔，随即又任湖南谘议局筹办处会办。王自称一向不愿干预官事，这些职衔都是怎么也推托不掉的苦差。而旁观者则发现，王先谦好请托有头脸的门生，还受人钱财。

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起，王先谦栽了跟头。湖广总督瑞澂奏劾王领銜电请更换湘抚，有挟饥民压官府之嫌，王被降了五级。王声称从未参与其事，湘籍京官亦联名为他辩诬，未果。这一年，恰是他的虚岁七十寿辰。

辛亥革命后，王先谦改名为“遯”，此字今作“遁”，意为逃避。这很鲜明地表达了他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和立场。为了逃避，他更换了多处寓所。但他终无法逃过疾病，1917年，七十五岁的王先谦死于凉塘寓所。

以上所录为我的旧文，原标题为《晚年改名的王先谦》，载于1996年1月4日《新民晚报》，为该报专栏“名流寻踪”之一种，字数限于一千之内，未注引文出处。记得当时栏目的策划者兼编辑张晓敏先生谓其他名流都是正面形象，从王先谦开始刊出反面人物。

十八年之后，检视相关研究成果，可谓今非昔比，仅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就蔚然壮观。但可信度和深度呢？是否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对王先谦政治思想的评断，从“湖南顽固派之魁首”，到“温和保守派”，再到“处于维新与保守之间的中间地段”；肯定其“有一定的爱国主义”，又“始终停留在封建的水平上”。而对王先谦学术思想和成果的研究，近年更趋之若鹜，既有对王先谦整体学术的探究，也有对其

专门著作的研判。其头上的桂冠，已叠加到“一代杰出学人”、“汉学大师”。

这样的研究，是否从相反的方向得出了同样经不起历史检验的结论？限于篇幅，前引小文只是点出了王先谦在历史关键处的选择和自身的矛盾，当然也限于史料，无法揭开其谜底。困扰于胸的一些问题，也并未因为近年的相关研究成果而得以解惑。正好借此机会，提出以下问题，以请教于高明。

一、在苦尽甘来、仕途一片光明之际，王先谦为什么决意辞归？

时至王先谦的父亲一辈，家道衰落不堪，其祖父为县学生出身，以课徒为生，“不善治生”；两个伯父或无能或败家，家中事唯有其父王锡光担当，终日劳碌，“四壁萧然”。家族振兴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王锡光育有四男四女，本来复兴有望，孰料长子、次子在咸丰年间二十多岁病故，幼子后亦在同治十年（1871）亡故，大女、三女、幺女皆未逾岁而夭折。长子一表人才，学问亦好，早熟顾家，是给诸弟上课的小老师。王先谦一岁出痘疹，成为麻脸。无奈的王锡光把宝都押在王先谦身上，三岁发蒙，期许于“扶世翼教”云云，那是功成名就后的追忆，镶嵌在政治正确的光环里。直截了当地说，他实际肩负的是光宗耀祖的重任。

王先谦长相不如其大哥，但资质一流，秀才、举人、进士，都一试试而过，且后两项连捷而就。可惜王锡光未及看到儿子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的这一天，在王先谦十九岁时病故，年五十一。

1865年二十三岁中进士，王先谦可谓少年得志，扬眉吐气。而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无疑让王先谦深感遗憾。更令人感叹的是，一年之后，王先谦妻子、周寿昌侄女难产，与双胞胎女儿同亡，王先谦在《悼亡诗》中写道：“十日之内，三口并殒。家难之剧，不可为言。”

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仕途畅顺与家庭巨变交织，但并未影响到王先谦的从政志向。即使其弟在1871年病故之后，老母无人照料，王先谦续弦后一月，即偕妻子和老母一同北上，“余家老者、幼者、疾者、亲戚贫者，皆率以行”。这表明，此时的王先谦丝毫没有退隐的想法，在仕途起步之际，他也不可能退隐，否则回籍之后的生计无以维持。

一大家子居京城不易，王先谦更揪心的是无后的恐惧：1874年，两岁四女殇。翌年，长子出生，王先谦喜极而泣，“每怀先泽宜昌后，及到中年转自疑”。未料长男一年后夭亡。1877、1878年，三岁的五女

和两岁的七女相继夭折。1879年，一岁的次子再离人世。王先谦如何自处，更难的是如何面对他的老母？我们的历史学家有过同情的理解吗？

与家庭惨剧相对应，王先谦仕途可谓一帆风顺。按照十年一个阶段算，前一个十年从编修升到翰林院侍讲（从正七品升到从四品），后一个十年再到国子监祭酒、学政（仍是从四品），但再往上走，就进入高官行列，起码位至从二品。而外放过学政且在学政位上获得优秀政绩者回籍之后，至少能轻易在省城书院占据一介教席。王先谦是在弹劾“清流”和大太监李连英之后辞职，他既获得了敢言的声誉，又头戴著名学政的光环，此时辞官回籍，等待他的不只是一介教席，而是书院山长。这个位置上的收入远远高过京城的正一品大员。在膝下无后、老母为此近乎精神崩溃之际，辞职回乡，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选择吗？

二、在“清流”人物行情见涨之际，与其见解并非南辕北辙的王先谦为什么挺身抨击？与康、梁的对垒，是出于政见的分歧？还是维护自身的利益？

王先谦首次在言路发声，是在1879年，即“清流”人物开始活跃之际。而此前三年，王先谦一方面儿女连续夭折，另一方面本职和兼职政绩优异，皇帝降旨表彰，并赏加四品衔。而王先谦此时上折，称“言路宜防流弊”，指责同僚张佩纶“迹涉朋比”，实为罕见。在最小女儿夭亡之后，王先谦已是“强颜破涕以慰老母，然肝肠寸断矣”。随后王先谦又上一折，痛斥刚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崇厚，其见解则与同样攻击崇厚的“清流”人物并无二致。接下来的王先谦奏折，聚焦于洋务弊端、军务废弛，痛斥贪腐，讲求外交策略和船舰机器制造，都切中时弊，他应该是“清流”的同调。那么，他对“清流”的抨击，就不是观点之争，他只是看不惯他们的做派。而家事不幸，让他脾气变坏。

这些言论说明王先谦并非头脑不清的冬烘先生，而是勇气和见识兼而有之的政坛后起之秀。替换崇厚的赴俄交涉大臣曾纪泽看中王先谦，实在是水到渠成之事。但正好王先谦老母去世，他不必再强装笑颜，也失去了光宗耀祖的动力。加上自身身体出现问题，“脑后虚惊晕眩之症”，他婉拒了出使差事。这一时期的王先谦既不保守，也不顽固，而是引人注目、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王先谦比“清流”幸运，躲过了中法战争之劫。所谓不幸中之万幸，他因母丧而在籍守制。这两年多时间，他在乡编文集，刻史书，初

尝文人的乐趣，或许从中发现了度过余生的有效手段。丧期过后，王先谦仍然按期返京，他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三年学政，隐形的收入至少过万，多则三四万。（参见何刚德：《春明梦录 客座偶谈》，49页，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有了这笔钱，王先谦后半生不仅衣食无忧，而且还可雇人著述、刻书。

1888年，三年学政期满。返京的王先谦再次因上折名震京师，奏折不长，只有三百余字。弹劾的是慈禧身边的红人、太监总管李连英。有关王先谦此举的动因当时就有多种猜测，在我看来，他需要制造一个体面离开官场的事件和借口。

1888年，四十六岁的王先谦返回长沙，随后被乡贤、主张西化的郭嵩焘聘为思贤讲舍的主讲，年薪六百，这收入是京城一品大员的三倍。次年在地方大员力邀下接任城南书院院长。到1894年，转入湖南最著名的岳麓书院，担任山长。在戊戌变法之前，王先谦并没有显露出守旧的态度，相反，他是与时俱进的。后来处于舆论风暴中的长沙时务学堂，其创始人实际上是王先谦，时在1897年。而创办这一新式学堂的动机，是为自己的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培养人才。计划上报后获巡抚陈宝箴批准，陈为学校取名为时务学堂，并改为官办。后来熊希龄任总理，聘请谭嗣同、黄遵宪，梁启超则任中文总教习，都是从这里开始的。王先谦并非西学的门外汉，否则曾纪泽、郭嵩焘没有理由对他频施青眼。对王先谦来说，他对康、梁的敌视，一开始也不是“主义”之争。看着自己的创意被人拿走，变了样，王先谦心情能好吗？当然，同行相轻，都是吃张口饭的教习，少年梁启超在长沙的风靡一时，对年老的王先谦是不是一种威胁呢？

与叶德辉相比，王先谦不太喜欢抛头露面，政治敏感度也远不及叶德辉。在自定年谱中，王先谦坦言，他一开始积极参与湖南的维新运动，听陈宝箴的演讲，自己也登台宣讲，他是维新事业的追随者、参与者。如果不是叶德辉的提醒，他真不知道康、梁的用心：“叶免彬吏部以学堂教习评语见示，悖逆语连篇累牍，乃知其志在谋逆。”到了这时，王先谦才与叶德辉联手。要说顽固、保守，也是始于此时。

## 二、叶德辉事略

叶德辉长得不好看。从1915年湖南教育会出版的《经学通诂》所

载五十一岁的叶德辉“小景”看，脸上麻子不明显，反而是一口龅牙喧宾夺主。古话说，“丑人多作怪”，说明古人就懂相貌与心理之间的连带关系。今网民说，“不作不死”，更凸显后现代式的调侃和嘲讽。行事高调、言辞犀利的叶德辉或许就是因这两句话而死吧。

仅仅把叶德辉的“作”归结为相貌，当然不靠谱。与王先谦相比，叶德辉的家族连衰落的资格都不具备，这是从科举做官的角度讲。一直到叶德辉中进士为止，上溯六代，无一人金榜题名，也无一人留下著述。换句话说，无论是在祖籍地苏州，还是在迁居地长沙，叶家都算不上耕读之家，其父祖辈的官衔多为捐来的。1911年，叶德辉编族谱，“其笔下的祖上变成了诗书史家，世代簪缨，从未间断。这种闪烁其词的描述，反映出他对家庭背景及出身异常敏感”。

叶家于道光末年避乱而迁长沙，迅速致富。据《郇园先生年谱》，富了之后的叶家“豪侠好义，又喜藏书”。身处民风彪悍的湘中，前者当然有收买人心的用意，后者则无疑是向诗书人家靠拢。在那个时代，仅仅有钱是不好意思拿出来炫耀的。

叶德辉生于1864年，号焕彬，又号直山，别号郇园。为长子，两岁“患痘症几殆”，捡回一条命，脸上却落下麻子。四岁发蒙，显露顽童特性，叶德辉回忆，“顾性好侮长，无论其为亲、为师，皆侮之”。除了秉性，这也与母亲宠惯有关。一直到十三岁，以读书为天下至苦。十四岁忽然开窍，“试为文，亦颇成章段。持以质前塾师，极称誉”。

1884年，叶德辉娶长沙九芝堂劳家二小姐为妻，显示出叶家财富的激增和在省城富室大户中的地位。次年二十一岁中举。1891年，其妻因生产而患痧症亡，从此叶德辉未再续弦，这殊为罕见。叶德辉后来种种与女优、妓女间的交往纠葛，自然与他的单身相关，不可一概以道德名义骂倒了事。1892年二十八岁中进士，同年中有屠寄、张元济和蔡元培等人。时隔七年才科举如愿，对别人属于正常，自负如叶德辉，一定嫌来得迟缓。名列二甲，不仅未能入翰林院，且朝考后以主事用，签分吏部，这样的龙门更像是鸡肋。高调的叶德辉从此再也不提这一段经历。日后叶德辉以“叶吏部”闻名，在他人是尊称，在他自己则是调侃和嘲讽。中试后约一月，其长子五岁而殇。叶德辉随即乞养回籍，其原因，实无必要猜测。仕途开局不利，殇子之痛，都给他提供了回家的理由，家资之富，藏书之丰，当然对嗜书如命的叶德

辉更有吸引力。

这一年，叶德辉只有二十八岁。但在长沙，他俨然以湖南第一藏书家自傲，同时也以目录学家、版本家、刻书家称雄。不仅省城的名绅大儒争相交结，就连湘抚也不敢忽视。也是巧合，叶德辉回家不久，新任巡抚竟是江苏同乡、金石版本名家吴大澂，官学名流，“从容游燕”，“谈文考古”，“极一时缟纻之欢”。晚两年接湖南学政篆印的江苏同乡江标也是名士，擅长旧学，且与叶德辉学术兴趣相近。“佣书卖字总寒酸，太息沿门托钵难。散尽千金仍作客，更无书札到长安。”这是江标抵任后次月叶德辉赠其扇上的题字，颇堪玩味，自谦自嘲之下，是财富的自雄和对权力的漠视。两位高官既是同乡，又是学问雅人，这时的叶德辉运气真好！为吴大澂鉴画，助江标出书，都是官学交往的佳话，难怪那位同时期同样博学而怪诞的名士王闿运在日记中以“噪妄殊甚”评论叶德辉，实在是嫉妒得可爱有趣。酒桌上称兄道弟，无人处恨不得取而代之，凸显出的正是年少得志的叶德辉在湘省学界和政坛的深厚人脉和强大影响力。

1896年，京师刷新政治的氛围浓厚，叶德辉为谋进会典馆而进京活动，该职最后给了另一个湖南人萧文昭，他是康有为保国会成员且懂西学，有人推断这是叶德辉后来“白眼新政的原因之一”。

此次在京逗留并非一无所获，首善之区的京剧热，传染给了叶德辉，促使他回湘后投资湘剧，进军娱乐业，成立剧团，培养演员，凭借其雄厚财力、人脉和学术素养，十余年之后，叶德辉成为该领域的龙头老大，其与伶人关系之密切也令人侧目。戊戌维新之后，叶德辉更显浪荡无忌，弦歌诗酒终日，湘剧名角侍陪。史家常以此痛斥叶德辉生活腐化，其实有厚污古人之嫌。捧角乃同光间京师流行风尚，自慈禧太后至潘祖荫、翁同龢甚至不得志的李慈铭都热衷于此，王文韶抚湘时所欣赏之红角曾随其入京达半年之久，然后以厚贄遣回。既不违纪，更不犯法，在位者尚且如此，为何要责备闲居在家、自掏腰包消费的叶德辉呢？而他确实是戏曲行家，曾指导日本留学生写出博士论文。至于说他在年近六十带弟子在上海宿娼染疾之类，终究是孤证。当然，叶德辉自称隐身平康北里，意在断绝官方往来的韬晦之举，显然也是自我拔高之词。

叶德辉遭恶评，当然不只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其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的表现，当时就被批为“保守”、“守旧党”、“顽固”。“主义”之争属

于人各有志，只要是出于己见，不曲学阿世，应该获得后人的尊重。今日凭而论，倒是康、梁难逃以学术附会政治之讥。叶德辉与主张维新的新巡抚陈宝箴起初关系并不坏，陈三立与叶德辉甚至走动频繁。梁启超初到长沙，“新旧各派人物一致欢迎，叶德辉亦常与文燕聚首”。江标倡西学，并未影响其与叶德辉的友谊。宗今文学的皮锡瑞与叶德辉也时有过从，尽管有过不快，但友谊得以终生维持。

如前所述，叶德辉与湘省官方一向关系融洽，由此而有“权绅”之目。1898年做《〈轺轩今语〉评》，向时任学使徐仁铸开战，并非私人之怨、意气之争。徐仁铸在1892年“分校礼闱”，又是江苏宜兴人，既是同乡，又是叶德辉承认的师辈，早有交往，两人实无交恶的理由。以叶德辉的脾性，事关“主义”和湘省学子的未来，便不妥协。本来唇枪舌剑，往复辩论，乃叶德辉的强项，用王闿运的话说，“叶焕彬声名甚盛，以能折梁启超也。梁之来此，乃为叶增价耳”。有风度地争论，非叶德辉所擅长，于是趋于人事冲突，《湘绅公呈》便脱离了理性的辩论。连一直忍让的皮锡瑞此时也失去了耐性，斥王先谦和叶德辉为“两麻”。维新失败之后，叶德辉借苏舆之名编《翼教丛编》，名重天下。这一年，叶德辉只有三十四岁。

1900年，革命军兴，反洋教起。奉湘抚俞廉三命，叶德辉编成《觉迷要录》，辟康、梁保皇，斥唐才常党人。朝旨驱外国传教士，叶德辉建议湘抚谨慎从事，并嘱湘潭县令保送传教士出境。由此可见叶德辉并非不了解西方。1903年日本人来湘创办汽船会社，开拓长江航运，得到叶德辉的帮助。叶德辉所宣称的不与官方往来，绝不可信。

叶德辉的厄运于十年后降临。此时的湘抚为广西人岑春煊，长叶德辉一岁，颇为彪悍，与保守湘绅不洽。1910年春长沙爆发抢米风潮，王先谦和叶德辉的名字都列于湘绅联名驱岑信中，湖广总督、满人瑞澂上奏，称叶德辉“性情狂妄，武断乡曲，包庇倡优，行同无赖”。旨下，叶德辉革去功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这样的结局，叶德辉一直喊冤，因为他本人并未具名，系他人冒用。但他也深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承“顽皮，所谓煮不烂也”。因言而招祸。

但叶德辉秉性难改。武昌起义前一月，新任湘抚余格诚、布政使郑孝胥来访，转述瑞澂好意，为其谋开复。叶德辉不领情，竟笑言：“吾辈归田之人，家居无异革职，是何足惜？窃恐不出二三年，中原官吏皆革职矣。”此话极具洞察力，不幸而言中。但在湘省大员面前戏言，终